

论杜甫仁民爱物的思想

——兼论社会主义文学如何对待古代遗产

何 国 瑞

社会活动的主体能给历史以影响者很少。杜甫能成为世界文化名人,对人类产生着永恒性的“杜甫效应”,是由于其时代、家世、经历、个性形成了交汇的最佳结构,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其执着儒家理想的主体精神。与王维对比,杜甫主体精神中最可宝贵的是仁民爱物思想。仁民:能以平等心对待百姓。爱物:体现了古代的环保意识。驳今人中“打倒杜甫”的思潮,究其实质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表现。“济时肯杀身”,“请为父老歌”,正是社会主义文学作者应好好借鉴学习的。

古今社会活动的个体,不管他是从事文艺创作、科学研究,还是从事经济、政治或军事活动,能给历史以影响的,总是少数。他们大多只在一时一地、只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产生过些微影响。有些人或可名噪于当世,死后则寂然无闻。有些人则能以“家”垂名于国别专史,后惠于国人同行,而能跨越国界成为世界专史上的人物是很少的。至于能成为世界文化史、世界通史上的伟人,则更是精励卓绝的极少数了。

杜甫,8世纪中国唐代一位诗人,不仅名噪于当代与后世文学界,而且成了中国通史上的文化伟人,20世纪又被国际称为世界文化名人,受到世界各族人民的学习和景仰,并对他们产生着影响。这是了不起的。用当代的流行语说,这是一种世界水平的“名人效应”。而且我认为,这一“杜甫效应”还远没有完,它具有某种永恒性的潜能。随着人类社会的愈益进步,人类三大生产(物质生产、人口生产、精神生产)愈益相互渗透融合,杜甫诗歌的某些部分将日渐褪色,失去生命力,但其主要作品和根本精神,则必将永不停歇地放射出日新的思想能量和艺术魅力,不仅给人提供永久的享受,而且会变成促使人类进步的力量。

二

为什么杜甫会具有这种永恒性的效能呢?

形成杜甫这样一个居于文化群峰中的峰尖式的伟人,离不开时代经济政治的发展和文化艺术的繁荣。微风吹小池,只能产生涟漪;狂风卷大海,才会掀起滔天巨浪。三生有幸,杜甫恰恰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、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巨大转折关头。而其家世、生平又恰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:他可以选取一个最佳的切入点,涌入历史巨潮,登上时代浪尖。杜甫艰难而又顺利地,无奈而又主动地抓住了这种可能性,让它变成了现实性。于是,我们中华民族的第三位人类级诗人(前两位是屈原、李白)就出现了。

唯物辩证法揭示,事物的发展变化,外因只是前提条件,内因才是发端、根据。优秀的、伟大的艺术作品几乎总是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时产生的。这差不多是艺术史上的一条规律。但处在社会重大变革的时代的艺术家,并不是每一个都会创造出优秀的、伟大的作品来。处在同一社会环境中,甚至有类似生活经历的作者,能脱颖而出的,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主体精神所致。

试看王维与杜甫。两个可说是同代人,王只比杜大11岁,同样经历了安史之乱,同样陷于贼手,杜甫从长安叛军中逃走了,王维却委曲于洛阳从贼做了官。杜甫此后创作的诗歌更贴近现实,更同情民苦,写下了反映这一动乱及此后社会危难的《哀江头》、《悲陈陶》、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等一系列垂世名篇。王维诗歌中却除“万户伤心生野烟”这一句外,就再不见对这变难所造成的苦难的描绘,哪怕就是个人的莫大屈辱,也不见流于笔端唇吻。唯有这样两句留下了淡淡的哀愁:“一生几许伤心事,不向空门何处消?”^①(“伤心事”可能指陷贼从官,也可能含平乱后皇朝对他的问罪)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别呢?这只能从主体精神世界的不同求解释。明末杜诗研究专家王嗣奭(1566—1648)在他积40年研究心得的《杜臆》中,评论到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等诗时,就曾透出个中奥秘。他说:“上数章诗,非亲见不能作;他人虽亲见,亦不能作。”这两句话实在说得极好。他把主客的相互作用及主体的主要作用说得简洁明白。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所描绘的现象,在杜甫的当时,绝非仅杜甫一人见到,为什么却只杜甫一人写出?就因为杜甫既规循祖训,奉儒忠君,积极出世,且个性纯厚,事事执着。王维呢,深受母亲影响,崇信佛道,消极出世,唯求自保,“中岁颇好道”,“晚年唯好道,万事不关心。”面对苦难,自然闭眼不纳,了无激情,又何来诗作呢?

三

杜甫的主体精神,博大沉雄,包含极富。我以为最可宝贵的,对我们今天也最有借鉴意义、值得学习继承的,是他仁民爱物的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

儒家思想从其阶级属性看,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;但作为一种社会理想,它又在某些点上具有一定的超越性,如“民贵君轻”思想就是一例。而且,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况:同样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,其政治代表和理论代表,往往会有理解上和实行上的差异。这种差异在某种特殊情境下,甚至会形成两者之间一定的对立和对抗。因为皇朝将相皇帝老儿往往更

多从自身利益来变通取舍直至歪曲儒家经典，而一些清流纯拙的儒生儒官，为了维护其道统的完整和尊严，理论上往往将儒家某些精神抽象化，神圣化，行动上常常是一丝不苟，执着得近乎迂腐，可爱复可笑。对立或对抗的结果，当然多是后者或被捐弃不用，或被贬官流放，或被杀身歿族。但在这种对立或对抗的过程中，后者所表现出来的精神（多半形之于笔墨吟咏），常常闪射出异样的光彩。这种情形，无论中外，无论是封建社会，还是资本主义社会（矛盾的焦点是如何实践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理想），无论是政治领域，还是文化领域，都曾反复出现过。

杜甫恰恰就是一个纯正执着的“腐儒”。他本来也打算走祖辈“奉儒守官”的道路，无奈仕途不畅。一再遭挫之后，生性耿介的他，就不再钻营，“所历厌机巧”^②，“独耻事干谒”^③，“不爱入州府，畏人嫌我真”^④，终至于像他自己说的一辈子“吾道属艰难”^⑤了。但他忠于信仰，始终抱着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理想，虽然是“取笑同学翁”，也终生不悔不改，反而日益坚毅，明知其不可为却要生死以赴：“老大意转拙，许身一何愚”；“齿落未是无心人，舌存耻作穷途哭”^⑥，甘心情愿担起无穷的责任，自背沉重的枷锁。正像元人马祖常所称道的：“平生无饱饭，抵死只忧时。”这种精神影响了中国几百代优秀的知识分子。

杜甫在坚持儒家理想中，特别突出的是仁民爱物的思想。“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”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。”杜甫在他仕途穷困之后，对此可说是身体力行的。

“请为父老歌”^⑦，这几乎成了杜甫自觉的创作思想，成了他主体诗歌的创作动力。明人陈白沙说：“拾遗苦被苍生累，赢得乾坤不尽愁。”这概括得很好。杜甫十分怜爱苍生百姓。他悲愤地揭示了当时社会“荣枯咫尺异”，描绘了贫富的尖锐对立，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“高马达官厌酒肉，此辈枵腹茅茨空”^⑧、“肉色晒菜色”^⑨。他悲叹人民征戍之苦，“孟冬十郡良家子，血作陈陶泽中水”，“黍地无人耕……儿童尽东征”^⑩。他时时体恤人民，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，甚至愿肝脑涂地，“济时肯杀身”^⑪，“我能剖心血……一洗苍生忧！”^⑫他能由己及人。当他由长安苦经跋涉迈进家门之时，就闻见小儿子刚刚饿死、家人号啕的惨景，可他就在自己陷入这突然的巨大悲痛之中时，马上想到，自己“生常免租税，名不隶征伐”，尚且如此遭遇，那些一般的老百姓，该更会是什么境况呢：“默思失业徒，因念远行卒”，“忧端齐终南，溷洞不可掇”^⑬。当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，“床头屋漏无干处，雨脚如麻未断绝”而彻夜无眠时，竟又马上想到天下的穷读书人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！呜呼！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！”这是何等的感情，何等的胸襟！这较之“老吾老”“幼吾幼”，是更进了一步，更高了一格。这不禁令我们想起俄罗斯伟大作家高尔基所塑造的丹柯——丹柯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点燃高举在头上，照耀着带领着在黑暗中的人们前进。从这里我们不是清楚地看见了同是世界级的文学家的杜甫和高尔基，在精神上的某些相通之处么？而愿为苍生剖心血的杜甫却要早高尔基一千多年哩！

杜甫对人民的爱，并不只限于愿望的表达和泛泛的关切，而是具体入微地施注于他的雇工、邻人旁舍。杜甫在夔州时生活稍好，雇有仆人叫信行。一天他派信行到山上去修引水到厨房的水筒，没想到天快黑时才修好回家。他既感动又感激又内疚又痛爱地写下《信行远修水筒》一诗，其中云：“触热籍子修，通流与厨会。往来四十里，荒险崖谷大。日曛惊未餐，貌赤愧相对。浮瓜供老病，裂饼尝所爱。”在韩愈看来，从事体力劳动的“下等人”就是要侍奉“上等人”的，要不然，就该杀！而杜甫对自己的仆人却爱之如子。既担心他大热天走远

路过险崖,又痛心他晒红了脸,饿瘪了肚。当他人还没回到家而水已流进厨房时,一见到回来的信行,立刻拿出他所喜爱的饼子给他吃,把浮瓜却留给自己。对照起今天有的人有的甚至是干部居然还虐待雇请的小保姆,杜甫的这种感情和态度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再如《又呈吴郎》诗,对常到自己草堂打枣的西邻“无食无儿”“贫到骨”的老妇人,那种贴骨贴心的体恤,古代中外诗史上究竟有多少呢?

杜甫的这种感情完全是从心底自然流出,丝毫没有一点故作的痕迹。杜甫的经历太苦了,他在颠沛流离中接触了太多苦难纯朴善良的老百姓,由己及人,由人及己,在平民百姓与自己之间差不多没有了尊卑上下的界线,也没有了一般儒士的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”的优越感,因此能以平等态度对待他们。生活经历使杜甫能置身于平民之中。他对平民的爱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、恩赐,而是设身处地,实心实意,尽可能给穷困者以救助。他不仅“药许邻人斲”^⑧，“拾穗许村童”^⑨，“遗穗及众多”^⑩，“枣熟从人打”^⑪；而且还时时注意维护他们的自尊心,如他对待孤苦无依的打枣妇人,不但劝吴郎,那怕是稀疏的篱笆也不要插,而且要更亲切随和地与她相处,“只缘恐惧转须亲”,以免使她感到难堪不好意思打枣了。杜甫真正成了这些平民百姓的知心朋友,彼此相处亲密无间。他曾自作对比:“不爱入州府,畏人嫌我真;及乎归茅宇,旁舍未曾嗔。”从中看出,他自己觉得他的真情真性,在住茅屋的人们中间才可任其自然流露,彼此互不嫌怪,而在官府中他却感到不自在,他看不惯官场那套虚伪。他曾被一老农强留其家,自卯至酉从日出到月出,泥饮开怀,“指挥过无礼,未觉村野丑”。毛泽东曾在读了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之后,写下批语说:“江州司马,青衫泪湿,同在天涯。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。白诗高处在此,不在他处。”^⑫其实,以“平等心”对待平民百姓,杜诗表现得比白诗要更为深刻更为自然,且白是深受杜的影响的。在这点上,杜甫在中国诗史上恐怕要算第一人呢。

有爱就有恨。杜甫对平民百姓的爱是那样深广,因此他对造成他们苦难的一些当权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。今天有人把杜甫说成是一个“博爱主义者”,这是无视事实的曲解。杜甫一再宣示:“嫉恶怀刚肠”^⑬，“嫉恶信如仇”!他大声疾呼:“必若救疮痍,先应去蝥贼!”^⑭他甚至对皇帝也进行大胆的反讽和谴责:“天子多恩泽,苍生转寂寥!”^⑮“眼枯即见骨,天地终无情!”“边庭流血成海水,武皇开边意未已!”直至从胸腔喊出这样惊天动地的呼号:“盗贼本王臣”^⑯!是“官逼民反”呵!他到晚年飘流于赴潭州的洪涛之上,沿途看见污吏贪官对民夫村女压榨的情况,禁不住提醒他们:“贵人岂不仁?!视汝如莠蒿!”^⑰这简直就是告诫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:莫再相信富贵的当权者满口仁爱的那套鬼话吧!恩格斯曾经指出:在资本主义社会,如果作家能“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”,就可“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,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”,“引起对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”^⑱。杜甫的这些忧民爱民、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关系的诗歌,是否也起了动摇封建乐观主义的作用呢?

“山鸟山花吾友于”^⑲,杜甫的爱是深沉的。他的爱有疆界,却是极广的。他爱平民百姓,爱劳动者,也爱自己和他们身边的犬、马、鸡、虫,爱祖国的山川草木花鸟。他对自己的一条老狗像知心朋友,顾念不已:“旧犬知愁恨,垂头傍我床。”^⑳他对自己乘坐的老马生病时的感情,令人眼热鼻酸:“乘尔亦已久,天寒关塞深;尘中老尽力,岁晚病伤心;毛骨岂殊众,驯良犹至今;物微意不浅,感动一沉吟。”^㉑他不忍卖掉他养的鸡,简直象个呆子、孩子:“吾叱奴人解其缚”、“不知鸡卖还遭烹。”他甚至在家里筑稻场时还耽心毁了蚂蚁窝:“筑场怜穴

蚁”^⑧。他见鸚鵡被关在笼里，像自己受到伤害：“未有开笼日，空残旧宿枝。世人怜复损，何用羽毛奇？”他对在长江里滥捕黄鱼、白小（二寸长的白色小鱼）的人，叱责为不义：“长大不容身”，“尽取义何如？”杜甫对猎杀林泽动物以为口福的“上等人”，怒斥之为盗贼：“衣冠兼盗贼，饕餮用斯须！”^⑨在杜甫眼里，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一鳞一毛，都是鲜活的生命，是可悟对互娱的兄弟：“山花山鸟吾友于”；是能彼此关切共心肺的知己：“一重一掩吾肺腑”。他出门游山，爱春日暖：“暮年且喜径行近，春日兼蒙暄暖扶。”^⑩他赏景归来，与鸟倾心：“入林解我衣……好鸟知人归。”^⑪他散步生怕踩了草：“楚草经寒碧……步履宜轻过。”^⑫他走路又怕伤了树，宁愿低头过，“交柯低几杖”^⑬，他乘渡船时会像儿童“凭几看鱼乐”^⑭。他曾一连写下《病柏》、《病桔》、《枯棕》、《枯枿》等诗篇，对它们遭蚁蛀、蠹蚀、雷拆、人剥，至使“萧萧半死叶”、“日夜柯枝改”、“凋丧先蒲柳”、“惨惨无生意”，而深感惋惜，“使我沉叹久”，“长成谈何易？”

当今世界，全人类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，及人们生存竞争日趋剧烈而造成的心理紧张精神危机问题，我们读读杜甫的这些诗歌，是否可获得某种启示、教益呢？杜甫这类诗歌中很多作品是隐寓民苦、暗骂官害的，但其中不少作品确也体现了“万物一体”、“天人相济”的思想感情，提出了如何善待自然的问题。这是不是我国古代诗歌中最早表现出来的环境保护意识呢？“长成谈何易？”“尽取义何如？”这种深沉的质问，不正出自于厚重的爱物道德感么！这是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四

80年代初，文坛上响起了“打倒杜甫”、“打倒曹雪芹”的声音（一并还有“打倒莎士比亚”、“打倒巴尔扎克”的声音）。这是伴随着“走西方现代派的路”的呼喊而同时出现的。这些年来“打倒”之声多已消隐，但实际上“反其道而行之”的，却大有人在，并加大了力度。这里涉及到我们应如何正确对待文学传统的问题。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要繁荣发展，能依靠“打倒杜甫”等大家来求得么？是的，“文随世变”，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，一代超越一代，是历史的常规。今天不能超过昨天，今人不能否定前人，历史就停滞了。但所谓否定，是分析之后有取有舍的扬弃，而绝不是一概反对和彻底决裂。俄国十月革命前后，一些人提出要把普希金、列夫·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“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到大海里去”（“未来派”），主张要与旧文化“绝缘”（波格丹诺夫）。这曾给无产阶级文化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失。列宁曾与这种观点作了反复的斗争，并最后战胜了它。这是一种极左思潮的表现。“文革”中“四人帮”鼓吹“彻底决裂”也基于这种思潮。而我国新时期出现的“打倒派”，曾是反对“四人帮”的，实则属于相反的思潮。为什么在对待传统文化遗产上，两者会走到一起了呢？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，这里且不谈它。

“打倒杜甫”，究竟要打倒杜甫的什么？看来主要是两点：

第一，要打倒杜甫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有些论家说：社会主义文艺老是强调“作家的使命感、社会责任感”，结果“越是使命感高，责任心越强，创作越不自由，最后丧失了自由”。如前所述，杜甫恰好是使命感、责任感很强的一个典范。他“济时肯杀身”，“抵死只忧时”。但杜甫是否因此而丧失了自由，失去了艺术的光辉呢？恰恰相反，杜甫正因为如此，正

是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、使命感的驱动下,才创作出了具有永久的思想活力和艺术魅力的许多名篇。

“打倒派”以西方现代派为榜样,其实,他们对西方现代派并不全了解。西方现代派中一些严肃的艺术家,也是提倡社会责任感的。德国的表现主义大家埃德斯米特(1890—1966)说过:“每一个人不是一个个体,而是和义务、道德、社会、家庭有联系。”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、文学家萨特说得更清楚:“尽管文学和道德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,但在艺术责任的核心中,我们看到了道德责任。”甚至具有“为艺术而艺术”倾向的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(1885—1972)也说:“好艺术是一种幸福,坏艺术则是一种罪恶。”^⑥杜甫不是应被打倒,而恰恰是因为其社会责任感强,应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。

第二,要打倒杜甫的“请为父老歌”的创作思想。因为“打倒派”主张和实行的是“顽强地表现自己的一个赤条条的‘我’!”这个“我”是“卓尔不群的”,“与庸众相对的”。他们认为,“只有自己”,才是“无穷无尽的精神创造力的根源”。这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创作思想。坚持以“艺术中必须有我”为理由,一概反对我国文艺传统中“为时”“为民”的创作思想,杜甫属打倒之列,当然也就不奇怪了。不过这些“新派”并不是真的要对杜甫宣战,而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“二为”方向怀有别意,借杜甫来发泄罢了。

无产阶级的导师历来强调,文艺创作必须是个性化的,指出艺术中必然有我。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文艺刚刚萌芽之时,就反对把文艺作品当作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。列宁在强调文艺的党性原则的同时,以同等的重要性强调必须绝对保证创作个性的广阔天地。但“艺术中必须有我”绝不等于艺术的内容就只是我,只是表现我,更不是说艺术的目的只是为了我,为了自己。文艺从诞生起,就是为了社会,为了集体的。在原始社会,前文艺就是适应人类战胜自然、与自然求得积极平衡的心理—情感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。古往今来的文艺,都有个为谁服务和为谁创作的问题。有的自觉,有的不自觉,有的公开宣扬,有的巧为掩饰。文艺为谁,创作为啥,有无是非标准和善恶尺度呢?有!这就是看文艺为谁服务能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,即有利于物质生产、精神生产和人口生产的提高,从而更有利于人类大多数生活的全面改善。

“文革”后不久,一些作家由于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和“四人帮”对党的文艺工作的破坏,而对“二为”方向一时产生误解和动摇,是可以理解的。他们很快转变了心态,创作出了优秀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品。但一些人受“西风”的影响,顽固坚持个人主义创作思想,轻则沉溺于一己的悲欢,反对理性,鼓吹“跟着感觉走”;重则追求享乐主义,唱拜金歌,哼黄色调,宣扬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,鼓吹“钱和肉是生命的最高目标”;更有甚者则在政治上打擦边球,发泄对人民大众的异己情绪和对立思想,流露出一种黑色心理,迎合西方“民主”思潮,鼓吹并实行“消解主流意识形态”。如此种种,与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不一致的,乃至相悖的。

通过对“打倒杜甫”、与杜甫对着干的当代文艺中的这种现象的简略分析,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种表现。多年来,文艺界、学术界已不太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看问题。在我国现实生活中,阶级矛盾固然是主要矛盾,但不论是经济领域、政治领域还是文化艺术、思想学术领域,阶级矛盾的现象都是存在的,有的还表现得十分尖锐。更何况在国际上,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生死矛盾与斗争,虽然改变了形式,却并没有停止。中

外历史证明，无论是复古、崇古，还是批古、倒古，无不是为了现实的斗争。我国现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有一些现象很有趣：有人在极力推崇孔子的中庸思想、仁道精神，说什么要振兴中华，非要吸取这种儒学精粹不可；有人却对一再自称是“乾坤一腐儒”的杜甫高喊打倒。这不矛盾么？实际上不矛盾。提倡“中庸”、“恕道”的人，实际上是只要别人去实行，以便于他们或明或暗去销售不利社会主义、消解马克思主义的东西。君不见，有的“名人”或演讲，或著文，反复提倡学术界要相互“宽容”么，可是当有人对他的“不当”观点提出正当批评时，他却马上改变了中庸的尊容，给对方施以狠毒的诛心之论和人身攻击。由此即可略略参透新中庸论者的玄机。杜甫由于现实主义的执着精神，或过于诚信其“仁道”，一方面施爱于“下等人”，视之为同类；另一方面抨击“上等人”，视之为寇仇，因而超越了孔子的“中庸”和“恕道”，但他骨子里仍是要维护社会的稳定的。杜甫的这种对现实的积极态度，自然要为“消解主流派”所反对了。记得列宁曾经说过，当你困惑于一种社会现象不了解其真面目时，那么你就仔细看看它客观上究竟对谁有利罢。无论是宣扬对一切都采取宽容的恕道也好，还是要打倒杜甫也好，客观上都是不利于坚持“四项基本原则”的。

杜甫去世一千多年了。他离我们已经很远；但却又离我们很近。他藉以生活和成长的时代、社会已经死亡，但他作品中却有着不随其时代社会死亡而死亡的东西。列宁关于列夫·托尔斯泰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托尔斯泰去世了，革命前的俄国也成了过去……但是在他的遗产里，却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。俄国无产阶级要接受这份遗产，要研究这份遗产。”^⑩我想这话也是适合于杜甫的。让我们更好地研究杜甫、学习杜甫吧！

注 释：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① 《白头吟》 | ⑲ 《壮游》 |
| ② 《赠李白》 | ⑳ 《送韦讽》 |
| ③⑬ 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 | ㉑ 《奉赠卢五丈参谋琚》 |
| ④ 《暇日小园散病》 | ㉒ 《有感》 |
| ⑤ 《空囊》 | ㉓ 《遭遇》 |
| ⑥ 《春秋枉裴道州手札》 | ㉔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4卷，第454页。 |
| ⑦⑩ 《羌村三首》 | ㉕⑳ 《岳麓山道林二寺行》 |
| ⑧ 《岁晏行》 | ㉖ 《得舍弟消息》 |
| ⑨ 《赠苏四徯》 | ㉗ 《病马》 |
| ⑪ 《寄唐使君》 | ㉘ 《鹿》 |
| ⑫《凤凰台》 | ⑳ 《甘林》 |
| ⑭ 《归溪上简院内诸公》 | ㉚ 《庭草》 |
| ⑮⑳ 《暂住白帝复还东屯》 | ㉛ 《树间》 |
| ⑯ 《张望补稻畦水归》 | ㉜ 《白露》 |
| ⑰ 《秋野》 | ㉝ 伍蠡甫等：《现代西方文论选》，第153、211、253页。 |
| ⑱ 《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，第3—4页。 | ㉞ 《列夫·托尔斯泰》 |

（责任编辑 张炳煜）